

“师傅：停止下雨”登上热搜背后—— 汽车智能语音为何状况百出？

汽车智能化进程不断加速，车机语音助手“听不懂人话”的情况却频频出现。近日，有网约车乘客发布视频称，自己在海南打到一辆7座商务车，行车途中下起大雨，司机着急地多次呼唤车载语音系统“关闭天窗”，但天窗却一直没有关闭，导致车里变成“水帘洞”。该乘客表示，网约车司机说天窗是系统自动开的，但是喊破喉咙智能语音也没反应，全车湿透，最后只能手动关上。随后，这一视频登上热搜，网友们吐槽称：“师傅应该说停止下雨，而不是关闭天窗。”

就在不久前，语音助手错误关闭车外大灯而导致撞车事故，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不仅如此，语音助手不响应、理解错误等情况，已成为车主投诉的新焦点。

状况百出的语音助手

针对上述网约车车机语音助手无响应事件，星河智联研发工程师告诉记者，暴雨天气天窗敞开后，雨水拍打、狂风气流、路噪及发动机噪声叠加形成巨大杂音，大幅降低人声识别信噪比，车顶麦克风还易受潮影响收音，再加上车辆车机降噪硬件配置有限、雨天网络不稳定、车身电路或控制系统异常等多重因素超出车载语音助手的识别工作极限，因此即便

清晰下达关天窗指令，语音助手也无法准确识别。

记者从多家车企研发工程师处了解到，暴雨天气情况下，语音助手无响应、响应速度慢或识别能力欠佳的情况已是近年来行业智能化发展中的通病之一。

除了“车外大雨、车内小雨”的意外情况，“听不懂人话”的车载语音助手还隐藏着更严重的安全隐患。今年2月，一名领克车主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自己在车内向车机语音助手发出“关闭所有阅读灯”的指令后，

车机系统却错误地将车外大灯关闭，最终导致车辆撞上隔离带。

J.D. Power发布的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新车质量研究(NEV-IQS)显示，语音交互具体车主投诉点包括识别精度不足(比如：连续长指令识别失败)、响应卡顿、交互逻辑生硬等。尤其当消费人群转向“00后”等年轻车主时，他们对语音流畅度、智能交互要求更明显。

不可取消的物理按键

随着汽车行业步入智能化竞争下半场，堆叠配置的情况屡见不鲜，过度智能化的议论声此起彼伏。以车载语音为例，根据佐思汽研发布的《2026年车载语音行业研究报告》，2025年，中国车载语音系统搭载量已达1942.8万辆，渗透率约84.7%，新车近九成标配车载语音系统。其中，新能源乘用车语音渗透率达91%，几乎全系标配；燃油车语音渗透率达76%，中低配逐步补齐。

但是，在真实使用场景中，消费者对语音助手却颇有微词。上述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新车质量研究(NEV-IQS)显示，车主对信息娱乐系统的抱怨占比已经连续三年(2024—2026年)位居榜首，其中就包括了语音交互。

业内人士认为，针对现阶段语音操作系统存在的局限性，保留物理按键仍有必要性。

今年2月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征求意见稿)提到，随着电动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虚拟操纵件应用日益广泛，一些与行车安全紧密相关的操纵件需要通过标准规范为实体，以尽量保证盲操性和可达性，避免驾驶分心，提升行车安全。该标准将挡位控制(严禁纯屏幕换挡)、灯光/警示交互类、视野除雾/雨刮、车窗应急控制、应急保命装置等合计19项列为强制实体操纵件，覆盖行驶、避险、断电全场景。

(第一财经)

从阳羡茶看茶税的历史演变

江苏宜兴古称“阳羡”，亦称“义兴”，自古就是江南核心产茶区。宜兴的阳羡茶久负盛名，唐代诗人卢仝曾写下“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来赞颂阳羡茶。

阳羡茶的生产始于东汉，盛于唐代，历宋元明清而不衰，既是皇家贡品，也是历代茶税的重要来源。从唐代贡茶定制，到宋元榷茶专卖，再到明清茶引制度化，阳羡茶的税收历史，既是一部地方茶业经济史，也是中国古代茶税制度演变的缩影。

【唐代】

茶税肇始，税贡合一

阳羡茶在东汉已见载于《桐君录》，该书虽已失传，但书中“晋陵出好茗”的记载后来被陆羽的《茶经》引用。三国时期，阳羡茶成为孙吴宫廷用茶，但此时尚未形成固定的税收制度。

阳羡茶贡纳体系的正式确立始于中唐。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茶圣陆羽旅居湖州，评定阳羡茶“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常州刺史李栖筠据此上奏，始进万两茶，阳羡茶自此入贡。《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这一碑刻记录了阳羡茶开始以实物形式承担朝廷贡赋的历史。

大历七年(772年)，朝廷在与义兴相邻的顾渚山设贡茶院，贡茶院初期主要负责顾渚茶贡纳，后期兼管阳羡茶贡纳，岁贡定额逐步增加，最初每年上贡一万两(约850斤)，后增至万余斤。

建中四年(783年)，户部侍郎赵赞奏请“竹木茶漆尽税之”，茶税的征收由此开始。当时的茶税税率为10%，在州县山场与交通要道设官征税。贞元九年(793年)，全国茶税收入达40万贯，阳羡作为重



点产茶区，茶农与茶商均按章纳税，形成“贡茶(实物税收)+茶税”的双轨税收体系。此时阳羡茶税以贡为主、税为辅，是典型的税贡合一形态。

【宋代】

贡焙南迁，榷茶通行

北宋继承唐制，初期仍以阳羡茶入贡，后因气候与斗茶风尚兴起，由朝廷派官管理、专门制造贡茶的官焙移至建州(今福建省建瓯市)，阳羡茶不再列为核心贡茶，但仍是重要商品茶，税收纳入全国榷茶体系。

宋代茶叶产销管理制度严密，《宋史·食货志》专设茶法篇，实行榷茶专卖，官府垄断收购与批发，商人纳钱领引贩卖。《宋史·李若谷传》记载，北宋宜兴县县令李若谷整治宜兴的茶税，“置籍备勾检，恶者归民”，即建立茶户与产量的登记簿以备核查审计，劣质茶叶不再没收，而是退给茶农。此举一改此前扰民旧制，按茶园产量与茶户资产核定税额，成为江南茶税征管的典范。

北宋嘉祐年间，茶叶销售改行通商法，允许商人运销，朝廷按茶叶的交易额征税，每年茶税收入达百万贯以上。阳羡茶依托太湖航

运广泛行销，茶税以商税、山场税为主，税额稳定。此时，阳羡茶的税收已从以贡赋为主转向以工商税为主。

【元代】

官署专管，榷税并重

元代茶叶销售实行官营专卖与征税并行的制度，朝廷在宜兴张渚设茶园提领所，后升格为都提举司，统辖常州、湖州二路的2.3万亩茶园，是江南少见的地级茶务专署，直接管理阳羡茶的生产、贡纳与征税。

元代阳羡茶以“金字末茶”为贡品，贡额大幅增加。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刊刻的《重修宜兴县志》记载，元代“岁贡金字末茶一千斛，茶芽四百一十斛”。除贡茶外，元廷推行榷茶法。据《元史·志第五十二·食货》记载，茶商必须购买茶引(批准贩售茶叶的凭证)方可贩运，无引视为私茶，“但犯私茶，杖七十，茶一半没官，一半付告人充赏，应捕人同”。

阳羡茶生产区同时征收茶园税和茶引税，茶农按茶园亩数与产量以实物缴纳茶园税，茶商按茶引缴纳货币税，税收由茶园都提举司统一征收上解，成为江浙行省的重要财政来源。

【明清】

茶引定制，贡税分离

明代茶税制度简化，罢官焙，废苛贡，实行茶引制度与定额茶课，贡茶与地方税收彻底分离，制度更趋成熟。《明史·食货志》规定“凡卖茶之地，令宣课司三十取一”，即税率为3.33%。明朝廷还在宜兴设立茶引批验所，其主要职责为查验茶引、征收茶课，宜兴在当时与应天、杭州并列为江南三大茶检中心。

洪武十年(1377年)，朝廷给贡茶额度定制，规定宜兴岁贡芽茶40斛、叶茶13000斛，此后不再加征。地方茶课则按茶课钞、茶引银征收，明万历十八年的《重修宜兴县志》记录了宜兴茶课钞每年的定额为二百八十六锭三贯。贡茶与茶税分账管理，茶农负担相对均衡。

嘉靖年间，宜兴张渚茶引每年发放3298引，折合茶叶约165吨，茶税成为宜兴仅次于田赋、陶税的第三大财源。

清代继承了明代茶引制度，康熙朝后逐步放宽，从茶叶专卖转为以茶引征税为主，阳羡茶产销两旺，茶税体系更为完备。

雍正朝实行“摊丁入亩”，茶园税并入田赋，茶引按年定额，由县署招商领引，税款直接解送江宁、苏州布政司。道光年间，宜兴茶园面积近三千亩。茶税分茶课、商税、落地税、关税等项，茶农缴茶课，茶引行商缴引税与过境税，在市镇销售茶叶的商人缴落地税，如茶叶经太湖出省还需要另缴关税。

晚清开埠，宜兴红茶向海外销售，茶税又新增海关税与厘金等项，税负进一步加重。清代宜兴茶税，从实物、货币并行走向统一征收货币，标志着古代茶税制度走向成熟定型。

阳羡茶税以“贡赋—榷税—商税”为历史演变的主线，折射出古代赋税制度从苛繁到规范的历史进程。

(徐超 单蒙)